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六期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编者的话：于光远先生当属一二九一代。那一代人，无论从年龄还是精神上，都是五四新文化之子。对于他们而言，从五四到一二九，从启蒙到新启蒙，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延续。真正的分水岭是延安整风。整风的目的之一是要整掉国统区知识青年身上的五四新文化习气。那些不肯放弃的被整掉了（如王实味），多数则完成了从五四新青年到一二九干部的转型。其中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彻底改造好了，成了党的自己人，另一种却没能彻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机会终于到来，仿佛从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还是科学与民主，还是“真理即事功”，还是“破除迷信”，还是反封建……却比五四新文化多了一项“自由市场经济”，少了一项“反帝”。前者是五四时期的现实，彼时最时髦的概念是“计划经济”，属将来时，是一声炮响带来的；后者是因为遇到了逻辑上的困难。因为在现实中，帝国主义与科学民主是一币两面，不可能一边学一边反。改革的历史似乎就是“后退”的历史，胡耀邦说：“要退够。”这一退没有成功，却暴露了五四新文化的内在矛盾——“反帝”与“反封建”的矛盾。看来还是没有退够。郑仲兵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不是要改革，而是要改制。这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洋时期的主题了。

事实表明，于光远们虽然身处革命队伍，骨子里却还是五四新青年，不论过多少年，挨多少整，只要一遇机会，他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直到被整肃出局，彻底靠边站。

但于先生生性好动，好奇，好动脑筋。“要务”不能谈，就谈“文化”，再不济就谈谈“休闲文化”……于是有了谈“文化手段”的研讨会，参与者多是边缘化了的老人，他们投身其中的改革开放此时已是明日黄花。

其实变化还是有的。比如实践检验变成了“猫论”和“摸论”（总称“邓论”）；科学变成了科学发展观；民主变成了三个代表……而自由市场经济则变成列宁市场经济。这让人想起如来佛的掌心这类比喻，其实只不过鸟笼放大了一些而已。会上邵燕祥先生讲的鸟笼文化，正是鸟笼经济的对等物。这个鸟笼，就是一党专政，六四的枪声划出它的限度。这个界限不但掌握在“有关部门”，也划在每个人的心里。其要点是你并不知道它的确切界限在哪里，只好把圈划得小一些。这个限度随时变动，越变越小已成趋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于光远先生要“在文化运动和文化方面应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划时代的发展”的愿望是要落空了。

逻辑很清楚。文化的创造需要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的情况下的自由选择，包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身体和时间。而财产的私有，正是自由的前提，也是文化的前提。正如与会者所言，有钱才能有闲，有闲才能有自由，有自由才能有文化等等。当人们被迫交出财产，也就交出了自己的人身乃至思想的自由，就只能任由别人支配，造成新的人身依附。

从反面讲，要求共产者自然会要求权力的集中和思想的一致。为了严防外界和过去病毒的侵袭，这一违反自然扭曲人性的制度必然是封闭和压制的。这种制度根本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与人和人类的解放南辕北辙。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会产生什么值得注意的思想和文化现象。

正如光有休闲不能产生文化，光“文化手段”也不行。按罗素的说法，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文化手段”还不如没有，因为它只能产生和传播偏见和谎言。他说的就是“文化手段”被垄断的情形。在这次讨论会上，邵燕祥先生就发出感叹，他觉得他任何“文化手段”也没有。

回忆光远伯伯 郑仲兵

去年9月26日中午，天色阴沉下来，但觉头脑昏昏沉沉。突然，我的老朋友、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打来电话：于老今晨3点钟过世。头几天还很平稳，昨天呛后出现肺炎发烧，今晨就过世了。

享年98岁，算是喜丧；且两年来一直卧床，严重衰竭，处昏睡状态，他的离世，本是预料中事。但想到这样一个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理论奠基的伟大学者，竟在如此寂寞中死去，想到他几十年来对我的厚爱和教益，仍觉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仍有如丧考妣的心痛。

在我人生中，有过三次因失去可敬可爱的师友而产生弥久伤痛的经历。一次是2002年1月王若水的去世，接着秦川、李慎之、吴祖光、林子力、林润青也先后离世；一次是2010年朱厚泽的去世，接着童大林、李普、李昌、黄宗江、理夫、胡绩伟先后离世；再就是这次于光远的去世，八天前，他的学生、我的同辈好友张显扬过世，之后是女作家梅娘，中国石油开发泰斗级人物李晔先后去世，他们也是我的忘年交。为此我倍感寂寞和悲凉。有感于此，我写了首《哭光远伯伯》的悼诗：

相识相知一甲子，亦师亦友最伤情。
东风未暖西风劲，知己纷纷作古人。
泰斗宗师何所用，金钱权势最光灵。
横眉怒目应向谁？十里长歌哭先生。

相识相知一甲子

所谓“相识相知一甲子”，是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了于光远。那时，我正在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读初中。课余，有时我会到位于外交部街东口的《学习》杂志社去打乒乓球。那是我父亲郑公盾工作的单位。在乒乓球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于光远。我父亲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并要我叫他“光远伯伯”。光远伯伯问我几岁了，念几年级，有什么课余爱好等等。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微胖、连鬓胡子，毛发浓重，头发蓬乱，穿一件有几个窟窿的破背心，给人一副不修边幅的形象。他球技虽不很高超，但和人对打总能赢。我和他交过几次手，也总是输给他。他唯独打不过王惠德，王惠德是中南海乒乓球赛冠军，号称“海内冠军”。父亲告诉我，光远伯伯是《学习》杂志总编辑，“学问渊博，才华横溢，风声谈笑，雷迅文章”。几次打球的接触，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

的笑。他不仅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常常开怀哈哈大笑，笑声很大，甚至会笑得不能自己——笑出眼泪鼻涕、弯下腰，发出啾啾声。即便是打球，他也是不停地说说笑笑，操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会冒出一句令人捧腹的俏皮话，当然，有时别人还没笑，他自己先笑出来……从那时起，六十年来我都叫他“光远伯伯”。

五十年代中，我随母亲陈璋住到沙滩乙二号中宣部大院字字楼宿舍，光远伯伯就住在大院图书馆楼后边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进进出出有时还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冲我笑笑，但很少说话。那时，于光远名气已经很大，中宣部大院里的孩子也都知道他，还传说着有关他的轶闻趣事。

一是说他聪明绝顶，记忆力非凡：一次他在家会见慕名来看望他的人，足有二、三十人。来者中有人称赞他记忆力好。他听后很得意，说“今天不妨就考验一下我”。于是，由来者一一道出自己姓名，在分别时，于光远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出他们的姓名，结果一个不差，令在场的人大为惊奇，并传为美谈。当时中宣部子弟多是中小學生，最看重记忆力好的聪明人，于光远自然便成为孩子们崇拜的对象。

一是说他出书和发表文章最多，是中宣部的稿费大户；因为稿费多，所以是中宣部的首富，但他又最不把钱当回事。他除了将大把的稿费捐作党费外，时不时地还给中宣部幼儿园、食堂捐钱。后来中宣部在院内的“北大红楼”西北边，修了一座游泳池，也是由于光远和中宣部另一稿费大户曹葆华捐资修建的。游泳池的最大得益者，当属大院的孩子，所以我们对他都好。于光远究竟有多少钱？当时不仅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几乎每天都有邮局送来他的稿费单，由他的勤务员到邮局领取。他的勤务员还负责为他家打扫卫生、帮他给上海的母亲寄钱等勤杂事务。后来这个勤务员在北京市附近的农村家里，添置了高档家具以及收音机、自行车等当时的时髦货，其暴富行径，引起乡邻惊疑，引来公安局介入调查，查明该勤务员是个窃贼，并把他拘捕。其来源主要是偷盗于光远的钱财，而作为经济学家的于光远竟毫无察觉。

50年代中，我由初中升入高中，《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是高中阶段政治课的教材。也许因为这部书是光远伯伯和胡绳、王惠德编的，而他们都是我熟悉的父辈，所以这门课我学得特别用心，成绩也特别突出。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一时间，颇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象。当时中宣部也在图书馆小礼堂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开讲的就有关光远伯伯（当时他是科学处处长）和许立群、秦川、林默涵、王惠德等名人，他们都是中宣部正副处长。当年中宣部，不用说正副部长，就是各处的正副处长也都是既有革命资历，又有学术声望的专家学者。当时我对这些讲座极感兴趣，又因病休在家，所以经常也混进去和中宣部的青年干部以及学部的青年学者一起听讲。光远伯伯讲的两个专题，分别是经济理论和科学问题。我最爱听的是于光远和秦川的讲演。前者概念明确、逻辑性强、富有理性、发人深思；后者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实事求是，有特殊的感染力。他们俩讲演的风格迥异，但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听讲后，我还分别到过他们家请教问题。也许两位父辈看我幼稚浅薄，没有表现出对我什么兴趣。但是到了“文革”以后，他们都成了我的忘年至交。

反右前后，我就很少见到光远伯伯。反右运动中，小礼堂的学术讲座停止了，代之以接二连三的批斗会，小楼不断传出声嘶力竭的批斗声和口号声。中宣部食堂前面贴了许多大字报，我也跑去看，似没有见到写光远伯伯的。但听父母亲说，他的夫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光远伯伯也受到什么“影

响”。

1958年我上大学，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必修课，所用课本又是于光远与王惠德合著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当年我还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问题，为商品和市场问题，分别找过光远伯伯和林润青叔叔（科学处副处长）。

1959年，中宣部提拔许立群、姚溱、林默涵三人为副部长。当时，我听父母和一些中宣部叔叔阿姨的议论是：其实最应该提的是于光远。他们都为于光远感到不平。后来听说，1964年，因聂荣臻元帅的器重，光远伯伯才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中宣部所有部、处级干部都被当作“阎王”和“判官”遭揪斗整肃，光远伯伯自不能幸免，成为第一批被“革命”者。先是到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集中关“牛棚”接受批斗。当时我母亲也被集中到市委党校，但每周可以回一趟家。她说了一些于光远挨斗的情况。如说“革命群众”要他交代“为什么说粪是臭的”？（因为毛主席说过“粪是香的”）他竟列出粪的分子结构来，证明粪是臭的。结果引起“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还说，有从学校来的红卫兵批斗他，讲出一些道理，他觉得可以接受，甚至会高兴得赞扬人家，或感动得流下涕泪，弄得“革命群众”哭笑不得。

后来光远伯伯和我的母亲都被赶到宁夏贺兰县的干校。我母亲和光远伯伯又同在养猪班，他们在共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我的哥哥郑伯农和他的女友、妹妹郑立中、我最小的舅舅陈家庚（比我小两岁）到宁夏干校看我妈，都把还在挨批斗的光远伯伯当作自己的亲人，有好吃的就会请他及家人一起吃，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陪他去赶集或上银川逛街，带他的两个小女儿小东、小庆出去玩耍等等（现在还留存着好几张当年的合影）。那两、三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是蹲监狱，后来长期被关押在干校的土牢中，因而不能和他们一起去宁夏干校探亲，也无缘和光远伯伯见面。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光远伯伯被召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之一，从干校回到北京落户史家胡同8号。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遭整肃。我从湖北干校回京后曾与哥哥、妹妹、舅舅去看望他。他非常关心我在干校挨整的情况，同时也问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民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情况。

“四人帮”垮台后，我常和李春光（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因写过指向江青的大字报而闻名）一起去看他，当时由他负责正忙于和林子力等人合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实际上也是批毛）“批‘唯生产力论’”的书。虽然他很忙，但总愿意抽空和我们接触。加上我父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后，原住房已被人占用，后来也入住史家胡同8号西院，和光远伯伯成了邻居。所以每次我去看我父亲，也都会跑到光远伯伯家坐坐，有时我父亲也会和我一起去。但他并不多说话，主要是听我和光远伯伯攀谈。

1978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长期间给我平了反，三中全会后不久，我被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之后，和光远伯伯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除了世交关系、工作联系外，主要是我们观念和情感相投，逐步建立了深厚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三十多年中，日益加深。这是因为：

一是我看到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骨髓最硬；

二是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坚决和耀邦站在一起，成为实践派领军人物之一；

三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批评“凡是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确立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出特殊贡献；

四是理论务虚会前后，他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胡耀邦的重要顾问和助手，在拨乱反正，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批‘唯生产力论’”，提出生产目的问题，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现代市场经济，以及引进世界文明、创建新的学科做出卓越贡献；

五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敢于冲击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桎梏和陈云的“鸟笼经济”的枷锁，敢于抵制“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胡耀邦一起坚持全面改革，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秩序，做出不懈的努力；虽遭专制主义势力的长期不断的围攻打击而不悔。

六是他确有真才实学，堪称博大精深，兼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精通哲学和经济学，特别是他的创造性理论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恰是其他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家所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要理论奠基人。

七是在我人生几个重要阶段——在中宣部、在《新观察》杂志、在负责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和主编《精品》杂志、在中华文学基金会，以至在我退休后负责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和编撰《往事》民间读物等等，长达三十余年中，他对我持续的关爱、支持和教诲，吸引我参加他领导的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如经团联、国土经济学会、自然辩证法学会、《方法》杂志、市场经济双周座谈会等组织的活动和聚会），介绍我认识了杜润生、任仲夷、李慎之等一批中国卓越的思想家。我与他思想观念相投，政治态度一致，在我诸多忘年交当中，他和朱厚泽都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人。

2006年3月，我住院动大手术，怕他担心，没有告诉他。但他听说后于四月二日，还是冒着春寒跑到东皇城根我的住所去看我。当时他已91高龄。

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一、1978年4月，在拘捕红卫兵“五大领袖”时，也抓走了“新北大公社”的二把手孙蓬一。其实孙和“五大领袖”在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各高校以后直至“四人帮”垮台，都受到长期的整肃。孙蓬一是颇具政治眼光又极富侠义的人，当年是他最早提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他是抗日烈士的子弟，在抗日战争最后一年（他十四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是我和王若水、阮铭、李春光非常要好的朋友。1977年初，周恩来逝世周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同时批判“四人帮”。孙蓬一刚从天安门广场来到我家，约我去看阮铭。他情绪十分激动，对阮铭和我说：“我真盼着邓小平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调侃说：“邓小平也许最不喜欢你这样的人，他要上台，首先就会整你这样的人。”孙蓬一涨红着脸霍地从坐椅上站了起来，拍着桌子说：“就是再整我，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我也心甘情愿！”

然而，一年后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总想起这段孙阮对话的情节，心中有说不尽的酸楚，总觉得应当把孙蓬一的情况，特别是这个故事告诉邓小平。我认为他知道情况后，会高抬贵手。光远伯伯当时任科委副主任和新成立的社科院副院长，报上常登邓小平接见“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原排名如此）消息。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向光远伯伯倾诉，求他转告已经“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光远伯伯沉思了半晌，说道：“邓小平是很难说话的，他下决心的事，是很难改变的。我

只能找机会去办。”他的声音很低，情绪也显得很压抑。接着他又说——情绪似乎也放松了些：“孙蓬一这个人我还有一些印象，‘文革’中是他最早提出反对‘极左’思潮，提出王、关、戚，即中央文革的问题，也是坚决和谢富治斗争的人……对于群众组织的头头应该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他的这番话，令我十分感动。我看到在“老革命”中还有像光远伯伯这般开明，这般通情达理的人。当然，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出孙蓬一。当时邓力群、万里也都曾答应为此事做努力，但也终未奏效。孙蓬一后来被判刑进监狱，之后又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刑满后仍被变相关押，受尽了摧残，致精神分裂。回京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贫病交加，几次自杀未遂，后发作脑溢血逝世。

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期间，为引导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定期召集办公会即部务会外，还经常组织例会（联系单位负责人联席会）和务虚会（高层次的专题研讨会）。光远伯伯是跨两个会的重要角色。我作为工作人员，总能在会上和他见面。非常有趣的是，在会上，我注意到，除了发言外，他总是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东西。但是有时在别人发言时，他也会突然放下笔，插上一段话，而且接茬接得非常得体、非常有道理。大家都知道，他写（或改）东西不影响他听讲，他听讲也不影响他写作，他有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本事。以前就听我父亲说过，当年在《学习》杂志时，每逢开编前会，都要把重要稿件交给总编辑于光远审改。光远伯伯既要主持会，又要听别人发表意见，不时还要插话表态。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会开完了，他稿子也改完了，而且删改得很厉害，有的段落甚至改写过。

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异功能”假“人体科学”的名义蜂起。一次由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震寰组织的特异功能表演会，请中宣部派干部并代邀社会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观察，还特别提到“最好请于光远同志参加”。部领导让我参与其事。我对“特异功能”虽持否定态度，但抱好奇心，想看个究竟。我知道张震寰是12·9运动民先队成员，早年也到过延安，应与光远伯伯熟悉。所以见到光远伯伯时就和他说了。不料他竟勃然大怒，涨红着脸，大声反问我：“我为什么要参加？！”我惊呆了，不知所措。这时他的秘书胡冀燕把我拉到一边，笑着对我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最反对‘特异功能’了，不能在他面前提‘特异功能’。”我说是张震寰建议请于老的。冀燕说：“钱学森、张震寰就信这些，他们是总后台，把国防科工委当成‘特异功能’的阵地，不知花了国家多少钱。他们在‘特异功能’问题上和于老是死对头！”

几天后，我又见到光远伯伯，我不敢再提“特异功能”的事。但他并没有忘记，倒是笑着对我说：“变魔术你能看出破绽吗？你如果能看出，人家还能表演吗？你去参加‘特异功能’表演会，你能观察出什么？以后你还怎么表态？不要上他们的当！”接着他还告诉我：在“特异功能”问题上，邓小平不表态，陈云是相信的，胡耀邦持否定态度，但主张“不争论”。我跟他说：前几天我听说，几个“特异功能”大师搞“离体转移”没搞成，便解释说，因为隔壁房子有于光远，他的气场太强了。他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四、我每次应约到他家里，他总是在写东西。进入他的书房，他会抬头冲你笑笑，然后接着写他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孟阿姨（他的夫人）来倒茶和我或我们寒暄。非得等到他写完一个段落才跟我（或我们）谈话。谈话时他也非常投入，每次见面他都有新的话题，从不重复上次说过的。我真佩服他的大脑功能，怎么会有那么多感触，又有那么多的认识，而且都具理论化。他即便在和我们谈话，还是没有停止他的写作，只是把“重点”放在谈话上。有时谈话到兴头上，他上洗手间，也会唤你进去，说：“进来吧，没关系！”，他就坐在马桶上和你继续谈

话。好在他家的洗手间很大，还放着一两把椅子。他真是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了。有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报导他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写了两篇文章。我问他可此事？他回答说：“略有差误，不是两篇，而是三篇。”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

五、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某大酒店去参加一场研讨会，会间，他上洗手间，因为他是从主席台上走的，所以我没有陪他。但我注意到他好半天没有回来，便到厕所去找他，没有见到。我有些慌了，便和胡冀燕在酒店各处找，还是没找到。还是冀燕有经验，说这里还有几个会，我们到各个会场去找找看。终于在一个全国性研讨会的会场主席台上找到了他。原来他如厕后走错了会场，该会议主持人见是于光远，喜不自胜，说：“没走错，没走错！”便把他迎到主席台中央。冀燕跟我苦笑道：“以前也出过类似的事，就是到酒楼参加酒会，也是走错了大厅，结果被拉到别的宴会上吃了起来，他也不着急。”光远伯伯是中国大名人、大学者，认识他的人又多。别人请他还请不着，他走错门儿了，对别人来说是“正中下怀”。有趣的是，他自己也还心安理得，认为无所谓了。

六、我和光远伯伯接触应该说比较频繁，但我从来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情绪消沉，他总是充满自信，踌躇满志，洋溢着乐观情绪。他也从不优柔寡断，遇事遇人，总能很快做出明确判断。记得1986年底、1987年初，邓小平逼迫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又要求召开高层“生活会”批判胡，接着又由邓力群出面策动中顾委召集批判于光远的“生活会”，还安排喻权域等一批非中顾委的人员到会充当打手。在“生活会”上，光远伯伯奋起抗争，使邓力群等人的权谋破败，还赢得会内会外广泛的同情与赞誉。会一开完，光远伯伯就把我和他的老部下林京耀叫到家里。当时我们都为他遭整肃感到不平，想给他点安慰。不料，他丝毫没有委屈神态，而且，经过九个半天的鏖战，也没有一点疲倦的样子，他神采飞扬，一副得胜回朝的样子。他向我们讲述会上他如何揭露邓力群等人的诡计，如何把喻权域等人批驳得哑口无言，兴奋得不时爆出响亮的笑声。

1989年秋，《新观察》被勒令关闭，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我跑去看他。当时光远伯伯与杜润生、李昌、李锐也正遭批判整肃。虽然不见他往日的阳光情绪，却也未见他悲观消沉。他对我说：“我把面对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我意志所不能及的，比如人家会怎么看我、怎么处置我……我不去想它；还有一类是我意志所能及的，比如，我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怎么做人、怎么说话，我要认真对待。”当时我正处于因极度悲愤而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光远伯伯这席话，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使我从困顿惶惑中得以顿悟。

七、1991年底，光远伯伯被查出患乳腺癌住院手术。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男人患乳腺癌是非常罕见的，差不多20万人中才有一个人得这个病，“非常荣幸，我就是这二十万分之一”。说完他竟哈哈大笑起来。人们常把癌症称作绝症，当时我正在为他担惊受怕呢，而他仿佛在说课题的数据，仿佛在说一件新奇的故事。后来，他因输血又感染上丙型（或是戊型）肝炎，不得不停止化疗，住进解放军302医院调治。我去看过他三次，他一点没有表现出对病的担忧，而仍像在自家书房一样，不断地看书、写作。一位护士对我们说：于老的乐观、于老的勤奋，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住院期间，他还写了40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完成了2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在这期间，他还溜出医院，偷偷地参加过两三次老朋友们的聚会（吃饭、聊天）。到了1993年，肝病指标刚刚稳定下来，他又外出跑了许多地方去考察，那一年跑了香港、上海、浙江、天津、广东、海南等地。他跟我们说：“学问有的是坐出来的，有的是跑出来的”。

八、1992—1993年，光远伯伯多次跟我提到他喜欢邵燕祥写的文章，既有思想又有文采，说他要向燕祥学习。他还自嘲道：“我的文章就是稍逊风骚”。不久，他提出一个响亮的目标口号：“要做21世纪文学新秀”。他的老朋友葛戈（著名化学家）还为他篆刻了一枚这样的闲章。当时他已经88岁，我也只把他的话当作“老顽童”的豪言壮语看待。没想到，不到21世纪，他的一部又一部的散文随笔集都出来了。其中有《碎思录》、《古稀手记》、《文革中的我》、《我的编年故事》、《酒啦集》、《窗外的石榴花》、《细雨闲花》等等。

其中《细雨闲花》的书名是我提议的。1996年他将1977年以来写的散论随笔一类的文章编撰成一个集子，他问我：你说取什么书名好？我想到唐诗中刘长卿的诗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我说历史发展的河流，基本上都是在“看不见”、“听无声”中流淌的。您写的这些散文、随笔，也正是二十年间这种“看不见”、“听无声”历史流淌的记录，书名可否叫《细雨闲花》？光远伯伯听后表示认可。

九、1994年冬天，光远伯伯约我和作家牧惠、广东著名女记者方小宁一起去看望夏衍老人。当年光远伯伯79岁，夏老94岁，他比夏老小15岁。我们在夏府客厅中等候，半个小时后夏老才由他的女儿沈宁扶着出来。夏公似乎更瘦了，和往日见面时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不同，今天是闷闷不乐、少言寡语。看得出他生病了。平常我常见到人们对于光远这个老人家的尊重和爱戴，今天却看到他这个老人家对他的老人家的尊重和爱戴。他为了让夏老开心，说了很多趣事，还用川音唱了一首四川抗日民歌，显得格外的年轻活泼——这是我从未看到的。

忘了是谁讲了一条新闻：最近，李锐在北京医院遇到薄一波，薄凑到李的耳边，小声地问道：“那个‘地下总书记’近来怎么样了？”说者以此表示薄对邓力群也不以为然。不料，夏老突然开口：“薄一波的话，你们也相信吗？！”真是石破天惊，一语道破。光远伯伯后来和我赞叹说：夏公太明白了！

因为考虑到夏老的身体，我们谈话没有多久，便让他回房休息。沈宁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老人家最近身体一直不适，你们来时他正在厕所，便秘弄得他很难受。我和光远伯伯说了，他感叹道：“夏公是非常顾全体面和尊严的人，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难受。”几天后夏老住院了，一直就没有出来，两、三个月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泰斗、卓越的思想家便与世长辞了。所幸的是，那天方小宁给我和夏老一起照了相；那天，光远伯伯的举动，也特别让我心动，我看到他是真正认识到了夏衍的伟大价值。他的这种眼光、这种情感、这种人生境界，是在朝的衮衮诸公所望尘莫及的。

“你们要爱护光远啊！”

1996年，学术界的朋友为他举办《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研讨会》，分别开了他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三个研讨会，之后还决定开一场他的文化思想研讨会，并推举我来主持。他本人建议，会议可就文化作为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功能问题作些讨论。这个会12月10日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举行，二百多名新闻、出版、社科、文学、艺术、翻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会。朱厚泽、李锐、马惠娣、邵燕祥、蔡德诚、张扬、黄宗江、秦川、戴煌、胡绩伟、曾彦修、童大林、吴象、曹思源、李辉、陈四益等人相继在会上发言。大家都充分肯定六十年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

光远伯伯在会议的头尾说了两段话。他说自己在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都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恩格斯有这样的自谦，他最尊崇恩格斯）。但“我的优点是比较老实，不会装腔作势”。他说：“我最讨厌的人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伺机整人。”我知道，光远伯伯“最讨厌的人”，应该是胡乔木、邓力群一类的人。

我在开场白中突出提到：于光远“从青年时代开始，作为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者、文化人，后来又长期担任文化机构高层领导人，但是他真正的凝聚力，始终是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是知识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而不是他的权力。他积极乐观，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不为条条框框陈规陋习所束缚，有真正学者风范。他不倚仗权势，没有霸道，没有阔气，有很強的宏放性、开放性、包容性，有继往开来之精神。他的双重身份，没有形成他的双重人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这番话，自然包含着目睹三十年来官场，特别是文场的感受。我生有幸，能遇到如于光远、朱厚泽这样一批师友，他们是在专制主义黑洞中把我们引向自由民主未来的明灯。然而他们都命运不济，数十年来，他们一直遭受专制体制和党阀、学霸的弹压。

同样，我们这个会也受到“安全”部门的干预，会议期间派有十数名“便衣”前来监视。原来还准备在几个专题座谈会的基础上，开一个综合的座谈会。但由于“安全”部门的阻梗威胁，友谊宾馆也以“装修会场”为名，拒绝出租会场，综合座谈会便流产了。学界的朋友大惑不解：为什么全国最知名的学者又是中顾委委员——于光远的学术，竟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996年春，我陪同光远伯伯到上海。光远伯伯是上海市的顾问，他每次到上海，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都会去看他。那次先后去看他的有前市委第一书记汪道涵、市长徐匡迪、团中央书记刘延东以及市里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光远伯伯当时腿脚已经不灵，为了照顾他，我和他住在一个大套间的卧室里。他白天要忙着接待客人、参观、考察、开研讨会、讲演，晚上还要写作、看书，到十一、二点，他才躺到床上，继续靠在床头看书，一直到凌晨一、二点钟。我真奇怪，白天马不停蹄地劳顿，怎么到晚上还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因为我到午夜十二点钟以后，都觉得难以支撑了，但我还有“照顾”他老人家的任务呢！刚到宾馆的那天晚上，为了使老人家睡得安稳，我把窗户关上，又把窗帘拉上。不料他竟不同意，让我重新把它们开启。他说，“为什么要关上窗户呢，这样就不通风了；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这样我就无法知道是不是天亮了。一切要尽可能顺其自然！”他告诉我，从小他就有这个习惯。

在上海的一天，他拉着我和胡冀燕到华山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周谷城老人。刚见面时，周谷老有些木然，坐在病床上发呆，当时有个女护工在照看他。当年他已97岁。我们和他说了许多话，他都没多少反应，即便是答复我们的问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他突然认出了于光远，激动地抓住光远的手：“唉呀，光远啊，光远啊！”霎时间，思维也变得敏捷，言语也变得清晰而富于逻辑性。他一再说明，光远是他病中最想的人，是他一生见到的最有学问、最有才干的人。

于光远向他汇报了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会议和新选出的一届领导成员、以及公选他为名誉会长等情况。周谷老高兴地连连称好，说：我做不成事了，太平洋学会交给你（周谷老是前任会长，后推荐于光远继任），我就放心了。我印象中他们俩亲密地像谈家常一样说了很多话，我记得的是：

光远还问：周扬也是益阳人，你们是不是一个宗族的？

周谷老回答：周扬和我虽然都是益阳周姓，但不是一个宗族，周扬和周立波

同宗。

光远还问：你和郭沫若应该有较多接触？

周老说：是啊，但郭老老婆找得太多，我不敢苟同。

他们俩越谈越近乎，周谷老还说，报纸、广播说我们一切都好，越来越好，但从民间听到的，我自己看到的并不那么回事。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党和国家情况十分了解，信息十分灵通，对局势是十分忧虑。光远伯伯也谈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问题的看法，周谷老都表示赞同。

考虑到周谷老需要休息，我们只好告辞了。周谷老站起来和光远动情地握手道别，他说：“也许我还能活半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接着又跟我和胡冀燕握手，并对我们说道：“你们要爱护光远啊，你们要爱护光远啊！”声调恺切，形同哀求，我注意到他眼里含着泪水。我知道，他这话并不是冲我们说的，他哪里是冲我们说的呢？……半年后的11月10日，他离开了人世。

王惠德与于光远

说到光远伯伯，不能不使我想到他的老朋友、老搭档，也是我的老领导、另一位忘年交——王惠德。王惠德生于1922年，卒于1993年，享年才71岁，比光远伯伯小七岁，早逝20年。

王惠德和于光远早年都到过延安，1948年又都到了中宣部；他们合作写过《中国革命读本》、《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政治经济学讲座》等干部读本和学校课本；解放初，王惠德还继于光远之后担任过《学习》杂志总编辑；“文革”前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王惠德是理论宣传处副处长。“文革”中他们都受迫害。“四人帮”垮台后，王惠德的影响力虽不如于光远，但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人物；于光远是科委副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王惠德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理论务虚会上，王惠德和于光远等人先后有两次联合发言，反响极大；社科院马列所成立后，于光远兼第一所长，王惠德兼第二所长；改革开放中王惠德和于光远都赞同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对社会主义体制、对经济转型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在“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王惠德和于光远又都遭到专制主义势力的批判和整肃。

王惠德给我印象更深的，当然还是1980年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理论局长之后。王任重被耀邦推荐任中宣部长时，他原选中王若水任分管理论的副部长，胡乔木、邓力群不同意，推定了王惠德。但王惠德未为他们所左右，而是和胡耀邦、于光远、周扬等更亲近。他初到中宣部，给我的印象是：意气风发、思想解放。记得在一次会上，部长王任重批评当时知识界好讲“人”，而不讲阶级。王惠德当场顶了他，说讲人有什么不好，毛主席就讲人。王任重马上表示接受意见。当时我在场，暗自佩服惠德的胆识，也佩服王任重的雅量。

王惠德长得一表人才，白面书生，慈眉善目，身板比于光远胖些，颇有几分佛像。他来中宣部后，光远伯伯曾问我：王惠德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我把王惠德顶撞王任重的故事讲后，他大笑起来，并对我介绍说：惠德在延安时，就是才俊少年，能把精深的理论问题，表述得通俗明白，他甚至能背诵《资本论》一些段落，曾得到毛泽东称道。

来中宣部不久，王惠德便在理论局和马列所内部试讲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系统思考。他联系世界共运史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教训，对什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消灭“三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按劳分配，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商品和商品经济等诸多问题，都做出自己的回答。

之后又应邀在北京市委党校做了报告，我也在场。他的许多观点和于光远是相投相契的，对于当时正在开拓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他对劳动价值论，即劳动产生价值、并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提出质疑。他说，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还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社会愈进步，脑力劳动的含量就愈大，脑力劳动是无法用时间来计量的；而且产生价值的不仅有劳动，还有资本、还有管理，还有机遇，还有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他还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它要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从尊重价值规律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要斤斤计较，而且要两两计较。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迄今没有解决、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他说，不久前，一位日本社会主义问题专家向他讨教：什么是社会主义？意思是，既然历史实践证明列宁定义的几大特征的社会主义是不靠谱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回答人家说：我也说不清楚。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大实话。

谁料，他的讲演被他的老部下、时任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的马仲扬汇报给邓力群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于是，他的这些拨乱反正的理论探索，竟被诬为“否定社会主义”，加以整肃。当时北京市的负责人竟批判道：“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早就有过定义了，怎么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答不出来，究竟是共产党的中宣部长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面对这些浅簿无知而又专横霸道之徒，可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1982年，邓力群当上中宣部长，王惠德日子更难过了。到“清污运动”中，于光远被诬为“鼓吹一切向钱看”，王惠德被诬为“鼓吹斤斤计较两两计较”，一同被当作“自由化”的重点；王惠德又身在中宣部，更成了邓力群“关门打狗”的两个主要对象之一（还有一个是李洪林）。大会批判、小会批判，部内批判、部外批判。从那之后，他处处变得谨小慎微，再也听不到他那高屋建瓴、掷地有声的言谈话语了。他还多次对我们说，他年纪大了（刚到60岁），要争取“安全着陆”。不久，他便患了甲亢住进医院。

王惠德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和理论上的批判认识，可以说在中国未有出其右者，在世界共产主义批判史上也应有其地位的。可惜戛然而止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专制主义势力的压制和扼杀，另一面，也与他个人性格情感上的弱点有关。和于光远比较，于光远胸襟宽阔、性情豪放、抗压能力强，长于特立独行、举重若轻，面对强权，敢于抗争。如中顾委对他开批判会，面对批判者的胡言乱语，他敢于跳起，圆睁怒目作狮子吼。王惠德则温文尔雅、性情懦弱，抗压能力差，且心事很重，惯于逆来顺受、自我压抑。他在中宣部遭受无端批判时，常是对以默尔而息。

和于光远一样，王惠德也喜欢笑，见人就笑，到场就笑，不论和人谈话还是做报告，时不时会爆发出朗朗的笑声。这在理论界是出了名的。但是，自从挨整之后，虽然还能见到他和蔼可亲的笑容，听到他的笑声，但神情总带着几分凄楚。令我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光远是个乐天派，能自我排忧解难，他的笑，真是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王惠德一腔委屈和愤懑不得宣泄排解，郁结于心，他的笑，是苦恼人的笑！

所幸，1985年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王惠德又得到信任和尊重。他受朱厚泽

之托，曾主持处理“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报告事件”，澄清了人为制造的混乱，使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免遭一场大批判的浩劫，受到坊间高度赞场。

然而随着胡耀邦、朱厚泽下台，王惠德终于在“反自由化”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因长期苦楚郁积而罹患癌症，于1993年12月25日逝世。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北京医院和他告别，心中翻腾着我们共同经历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往事。不久，在于光远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王惠德纪念会，朱厚泽、王若水、洪禹、吴明瑜、李普、龚育之、冯兰瑞、理夫、张惠卿、曾彦修、孙长江、张显扬、彭克宏、胡冀燕等人参加。我在发言中，当说到王惠德只祈盼“安全着陆”而终未能如愿时，不禁悲恸痛哭，我哭这么一位杰出理论家不能伸其才智而被绞杀，我哭我们这个体制的无道和暴虐！

我想得很多

光远伯伯的辞世，我想得很多，我痛感到：这不仅是一代、两代人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一代人，是指当年怀抱争取民主自由，奋起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专制独裁；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又经历了共产党建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死去活来；后来在世界大潮的触动下，在痛切的反思中，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来改造共产党，彻底解决民生、民权和民族问题，但是事与愿违，结果却出现了主宰中国命运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也被这个党、这个政权所整肃、所抛弃的这么一代人。所谓一个时代，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以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时代。这个一代人引领的这样一个时代终结了，代之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制度为民主宪政这一基本内容的历史时代，即从“改革的时代”进入“改制的时代”。

于光远学术生涯六十周年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1996年12月10日)

郑仲兵：

今天的会，是为于光远同志学术活动60周年而开的文化座谈会。这个会由牧惠和我来主持。一方面对光远同志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光远同志提出一个课题：作为社会协调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手段。今天我们希望就文化手段的问题作一个专门的讨论。

光远同志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理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广义上说这都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狭义上说他一直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贡献。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者、文化人。后来，他长期是文化战线比较高层次的领导人，但是他真正的凝聚力，始终是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是知识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而不是他的权力。当然，还有他尊重科学，追求真理的真正学者的风范。他不倚仗权势，没有霸道，没有阔气，他积极乐观，有很强

的宏放性、开放性、包容性，不为条条框框陈规陋习所束缚，有继往开来的精神。他的双重身份，没有形成他的双重人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都说于老学贯中西、通古博今，横跨自然、社会、人文诸学科，但他又不是一般的学问家，他是具有很高思想境界的通才。在很多领域，都有他的理性足迹，思想火花，这些内涵，就是文化。于老是当代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师。

我们大家都是他的朋友，还有相当多是他的学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开这么一个座谈会，来研讨一下文化功能、文化手段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先请光远同志讲一讲。

于光远：

按照倒计时计算，还有3年多一点点，就到21世纪了。回想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我认为主要是两大成就：一条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还有一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文精神、文学艺术、教育、道德等等，怎么估量，我认为和前两条还不能够并齐。在20世纪，那两条是真正突出的。19世纪的文学与20世纪的文学比，20世纪就一定高？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不知道怎么判断。当然，20世纪的文化，在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方面都有很大进步，是不用说的。我认为新的文化要同现代非常发展的高科学技术和非常发展的市场经济相适应，这个适应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达得到的。所以，我有点希望，在21世纪，人文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文明能够并齐，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估量，不知道可靠不可靠，提出来，思考一下20世纪和21世纪的问题。

再一个，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化运动？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郑仲兵记得，1988年我提出来是不是能够在“五·四”70周年的时候开展起新的文化运动。快70年了嘛，再过些时候就快100年了，在文化运动和文化方面应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划时代的发展。当时我提出希望，应该能够讨论一年，在纪念“五·四”的时候。为这个事我说了两句话，而且我到许多地方奔波。一句话，就是要提高社会各界从领导到群众的文化意识。我觉得文化意识普遍不够。第二句话，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中普遍重视运用文化手段。现在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急需讨论，观点很纷杂。有不同看法好啊，有不同的看法才能探讨出真理出来。

到底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1940年延安开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会议，当时我在中央青委，就是这个会议分配我做文化工作。于是，我逐步地走上中山图书馆、自然科学研究会、读书会等工作岗位，做了这么些事。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就等于文化人，文化人就等于知识分子，吴玉章的讲话就是这么讲的。那个时候，有个方向问题，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刊物《中国文化》第一期上发表。那个时候这就是方向，在一个范围里的一个小的方向。现在需要就文化发展的方向进行讨论，到底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才是最好的？完全可以各抒己见。

但是这里面也要区别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积极文化，什么叫做消极文化，现代文化现象确实很复杂。我刚才给牧惠同志带来一本北京出版的，叫《民族文化传统读本》，其中有一本书《太上感应篇》。（朱厚泽：《子夜》一开始就描写那个老太爷拿着这个《太上感应篇》进上海。）在现代当作什么呢？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祸福无门呐，唯人自招啊，就是天上有个太上老君嘛，叫太上曰，有一个神，对好事坏事他作记录，好事给你加粟米，坏事给你扣粟米，扣完了你就死了，死了以后还作恶鬼。要靠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在现在

也是一种思潮，有书为证，不是空讲啊。

此外，现在伪科学流行。有一天的“焦点访谈”，江苏的沈昌把 100 块钱茶叶一发功就可以到 10000 块钱，两三年就成了千万富翁。他还告状，《工人日报》公布的，他告状。11 月 10 日在东城区开庭，在狭小的北兵马司一下子围了 2000 多人，高呼保卫沈昌教师，搞得法院不敢判。胜诉了，法院门口举行庆祝会；败诉了，说不定那些老太太动动手把你的房屋采取点什么措施，你也无可奈何。巫师、老太婆，能把他们怎么办？所以，现在有各种倾向问题，这是讲的最极端的了，还有不是极端的。到底中国的文化到何处去？应该能够把文化的手段很好地运用起来。

我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这是说的实在话，这个 60 周年有点浮夸。60 年里是搞了自然研究会，艾思奇他们一块，然后中间老是干这个工作那个工作，这都是没有多少文化，是假文化人。

我就说这几句，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有这么个机会，互相启发一下子。非常感谢大家！

朱厚泽：

光远同志刚才回忆到 80 年代末期他讲的两句话，一句话讲要普遍提高文化意识，一句话讲在各个方面要提倡运用文化手段。我当时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正是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一些曲折和困难的时候，而这些困难的出现，除了有它经济的和体制的原因外，我是很感到文化问题可能是一个我们讲不清楚、又不能不去面临的问题。

这一两年接触光远同志，在谈到休闲文化的时候，他也提出了很多很有创见的看法。我刚才看到发给我们的一篇东西，何伟同志的关于休闲文化的资料里边，就讲到普遍有闲社会里边的文化。这个东西跟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它一致的地方，好像也在一些问题上不那么协调。我们小孩时候就记得长辈教导：注意不要玩物丧志。跟何伟同志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的博物馆，各种陈列馆，如果要广泛一点讲，也可以纳入“玩物”之内。现在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反其正而用之。这个社会维持自身的生存，必要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短，闲暇会越来越多，怎么来看这个现象？人跟猪总是有点不同，吃饱了他不能光睡觉哦，那么如何运用闲暇就成为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那次我们议论的时候，我是提了两个问题提交光远同志、何伟同志他们搞休闲文化的同志：一条是不是要从玩物中壮志；第二条是不是可以通过休闲去进一步激励创造、革新，或者叫创新。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就非常危险。现在 5 天工作制，将来也可能 4 天，3 天，剩下的时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就变成了个傻家伙了，就讲不明白了。恐怕，在闲暇中为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享受文化创造提供更充分的余地，是更加具有文化创造精神的一个机会。

李锐：

我要讲的文不对题呀。谈手段是吧？我讲不到这个东西。我昨天收到一张报纸，《时代文摘》，它摘的文章叫做《由“黑五类”说到健忘症》。说的什么呢？两代人关于文革的对话。父亲 45 岁，女儿 17 岁，高中二年级，而且班上学历史数一数二的。父亲就问女儿：“四人帮”你晓得不晓得？他的女儿就讲，有江青、姚文元、林彪，还有一个是魏群。魏群是个踢足球的，她可能想讲叶群？问她晓不晓得八个样板戏？也答不出来，搞不清楚什么叫“样板戏”。（于光远：魏群

是四川全兴队的后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7岁,对当前的历史完全不清楚。(于光远:我还和这个小孩见了面,照了像。这个小孩的祖父是范长江。)范长江啊!大家知道了,范长江就是在文革中死的了。最近,我也是在报上看到的,德国城市纽伦堡,希特勒当政的时候在广场烧了两万本书,于是搞一个纪念碑。但是广场上搞个纪念碑交通啊等等都不行。于是有人设计,在广场挖个地下室,建个图书馆——这说到文化手段了,有关联的——摆几十个书架,能放两万本书的,但是那上面一本书也没有。建筑了一个没有图书的图书馆,在地下,上面用玻璃板盖上,走来走去的行人会看到。人家是这样纪念希特勒的烧书的。

我是在湖南念的中学,是很好的中学,在湖南有名的,86或87年举办八十周年纪念,请我回去。我就听说,学校文革时图书全部烧光。所以,我不能不有点感想:我们现在舆论上文革不让谈,这个就很困难。今天开这个会有什么用哪?我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点牢骚而已。这个会能见报吗?肯定不能见报。我还记得,纪念光远学术生涯50周年我也去了。听说是乔木还是谁就发脾气了,“给于光远开什么纪念会!”

我们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环境,一种莫名其妙的环境之中。我听说,最反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新成立的机构,是舆论方面的,它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中国资本主义要复辟,但是,这个机构下面还搞了几个公司,赚钱。事情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滑稽,赚钱它照旧赚,但是又反对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很有意思。

要讲到文化,讲到手段,我觉得我们这个“手段”很麻烦。首先今天这个会你就没法子报道,谁理你呀?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我们大家有点责任顶一顶,是不是?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新闻单位嘛,也许会说李锐你当然讲白话好讲,你80岁了,又不在位,我们在位,还有一个乌纱帽的问题。但确实是有一个责任问题。过去鲁迅《申报》上还有个“自由谈”哪,我们现在有没有“自由谈”?现在连“自由”两个字都变成贬词了。没有自由还有什么文化呢?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来讲,是没有止境的,永远发展的,谁能讲清楚?文化,没有自由讨论,你还有什么发展呢?我们现在不晓得搞得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第一是新闻界,第二才是文化界,对于当前这种文化上的怪现象、不合理的现象、没有道理的现象,应该有所抵制,使大家能够自由一点。不自由不能发展。

马惠娣:

光远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其智慧和博学为中国的经济学、哲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对我国当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学界独树一帜,被誉为大学问家。同经济学、哲学一样,他的文化理论与学说同样是杰出的,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在中国还无人能出其右。我昨天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他自80年代以来所写的文章,其中关于文化理论方面的有近百篇,这里还不包括他写下的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这些文章中涉猎了文化意识、文化思想、文化手段、休闲文化、竞赛文化、玩学、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中国文化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对文化深刻的和独到的见解。

早在1988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他就撰文,把文化理解为能够传播开来传续下去的人类优秀的创造物,而文化的发展,就是文化内容的发

展和文化传播、传连工具的发展两者的结合。他指出，文化内容不外乎科学、艺术、技巧、自然和社会知识、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等思想，而文化传播和传连工具不外乎学校、团体、课堂、会议等传播知识、技术和进行思想影响的机构与组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字、形象与声像设施，利用图书文物诸实物来起作用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电影放映、戏剧演出、音乐会、画展等各种文艺活动。进而他提倡，提高社会各界从领导到群众的文化意识，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中，除了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外，还要运用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和法律手段。他认为文化意识中当然首先包括科学意识，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他还认为，实施文化手段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是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讲求科学态度，提倡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注重科学研究，都要同违反科学、轻视科学的现象划清界限。因而，他倡导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为此，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十几个省市。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哲学家眼中的文化视野，不如说他的文化理论中融会贯通了经济、哲学、科学，而愈显现出智慧的卓越和思想的深邃。

休闲文化是他对我国文化理论的一个贡献。早在十几年前，他便洞察了这一文化领域的发展趋势，指出了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休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期间，他探讨了竞赛文化、旅游文化、玩学，探讨了休闲与人的生命质量，休闲与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述，接受他思想馈赠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企业，在获得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收获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思想的传播对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对人的全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近些年来，他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特色，也是令人瞩目的，他的许多散文、随笔，赫然列入散文名家之列。我曾读过他的许多文章，其中像《小咬》、《小胡》这些篇什，可谓名篇佳作，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艺术造诣。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寓意深刻，而语言却轻松幽默。我们知道，光远自 1989 年以来又经历了一场大病，另外他也是年龄近 80 岁的人了，但是，从他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个益发看出于老高尚的人品，展现了作者的博学。这一点文坛宿将也是难以比拟的。他戏称自己要争取做 21 世纪文坛新秀。其实，现在人们，包括职业文学家，对他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我们在祝贺光远同志从事理论研究 60 周年的时候，他的文化思想理论，又一次滋养了我们。他意味着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社会责任，给了我们一个民族的脊梁。

邵燕祥：

刚才说到闲，说到休闲文化，我想起鲁迅那个《三闲集》。因为鲁迅当时驰骋文坛，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当时的左派。当时就有革命派说鲁迅先生，你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因此鲁迅先生就说既然这样嘛我把这个集子叫《三闲集》。在当时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是没有闲的。用光远同志的定义来说，闲就是自由。他没有这个自由。以往我们都说，有钱才有闲，有钱阶级有闲阶级是一回事。我又想起鲁迅先生另外一本书，叫《准风月谈》。刚才李锐同志说到，我们今天有没有自由谈。鲁迅先生在“自由谈”上化名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编者由于当时国民党钳制舆论，就发出呼吁：吁请海内外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就是请大家多谈些风花雪月。鲁迅先生后来还是写了一些文章。后来他就把他的书名叫做《准风月谈》。当时鲁迅先生说了，谈风月不都是一个调子，我们历来有风有月的文字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叫做：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每句都嵌了

一个风、月。然后鲁迅先生的另外一本书干脆叫做《伪自由书》。所以说自由是个大问题。

今天仲兵、牧惠给我们这个研讨会定的题目是谈光远同志提出的文化手段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手段主体是指国家啊，政府啊，社会组织啊，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想了想，我是不能替国家去想什么事情的，不能替政府想什么事。我想我自己没有政治手段，我只是被施予政治手段；我也没有经济手段，身上就几十块钱；文化手段恐怕也谈不到，就是略识文字，用于文字，而这文字在我能不能成为手段还要看一系列的因素。写在这个纸条上的文字，这个手段作用有限，怎么能够变成印刷品，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手段作用。光远同志十八般武艺，手段比较多。

我想我们除了手段，我们还应该谈文化环境问题。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文艺界也曾经开过一些会，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想法。我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突破了鸟笼经济的局限，但是我们的文化恐怕一直还是鸟笼文化这么个状况。我今天想一想，是不是鸟笼文化，那个鸟笼是又往上加了一些条啊，栅栏啊，还是抽去栅栏啊？恐怕还是再往上加一条一条栅栏。这个不要写，那个不要宣传。我记得有个老同志说，我们现在好像宣传部都是“不宣传部”，告诉你不要宣传什么。刚才讲到文革，讲到朱铁志那篇文章。李锐同志刚才说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朱铁志，是我们《求是》杂志的一个年轻编辑，杂文家。他讲到孩子们不知道文革。现在写文革的文章，至少“文革”这两个字都变成忌讳了。所以是有一个问题。

去年以来，直到今年，日本的右翼势力、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们，不断地在篡改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我们曾经想写一些文章吧，提到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啊，不让他们日本的青少年懂得历史，我们对这种现象加以谴责。但谴责几回以后我们自己也心虚了。就是说如果人家问一句：你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你们的教科书是不是把你们中国近代的当代的历史完全真实地告诉了青少年呢？那么我们怎么回答呢？当然了，现在好了，现在关于日本也不大让写文章了，所以这个困难相对可以克服了。（曾彦修：今年几个领导人比去年好一点，稍微强一点。去年我不敢发表文章，今年发表的文章中，至少讲到日本的侵略吧。）但是彦修同志你关于日本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在安徽淮南那个杂志上发一下子，你不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啊。所以当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到现在就是有时候放屁还要找地方。这地方许放，那地方不许放。病态文化，首先是病态文化环境。所以现在如果说在报纸上写点文章，算是小试文化手段的话，恐怕也得有发表文章的自由这种可能。

蔡德诚：

今天，郑仲兵告诉我光远同志提出要谈文化手段。我今天这个发言也有点文不对题，因为我想谈的不光是一个手段，我想谈的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石的问题。在我看来，市场、科学和民主，在文化层次里是一种良性互动的三大基本要素，它是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普适性的基石，是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种共同的精神财富，共同的精神基石。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特别有必要强调。我们目前强调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补课，因为长期以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连同糟粕一块给破坏了。我认为补课是必要的，但必须清楚，是补精华部分而不是再将糟粕部分拿回来。我们现在在文化建设上，在恢复传统文化问题上，有一种倾向，就是只看到传统文化的重建，或者某种恢复的重要性，看不到现代文明现代文化要以市场、

科学和民主为基石这样一个普适性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来看，产权明晰以个人经济独立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社会发展，也就是最后形成一种市场的机制，它创造了人类几千年以来人身依附的解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马克思提出打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但是还讲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在劳动者一无所有、无产阶级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所有的所有制，这说明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经济个体性、主体性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焕发出那么大的生产力？短短的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高速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文明，当中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人身与思想的依附被解脱出来。劳工可以被这个资本家雇佣，他也可以主动退出来被另一个资本家雇佣，这种人身和劳动的自由以至到精神层次的个性的发展自由，就使得每一个人的潜力和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全面发挥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马克思对社会目标的归纳是非常漂亮的。他的第一个目标讲的就是生产力极大地发展，物质极大地丰富；第二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第三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个性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全人类的解放。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每一个社会成员个性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真正看到了每一个人的潜力和其聪明才智发挥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上层建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现代文明的精华我认为就是市场、科学和民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有一种脱离人身依附的机会；科学本身，我们搞科学实验的或者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都深深体会到有五个基本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就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而这五大要素，都有深刻的民主内涵，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意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

我认为不可以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人为地引向某种对立，否则必然是两者的糟粕部分恶性地结合，造成各种愚昧甚至各种权势集团的出现。

另外，我认为不可以搞这种人为的主观意志的一种钦定式的框框式的文化，也不可以搞牵线式的木偶式的文化，应是人的自由思想之花，就像有的同志所讲的科学是自由思想之花。否则，我们真正有尊严和独立思考的文化的智者，必然不会甘心屈于一种附属地位的摆布，必然要退隐出来，要保持距离，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腐败的东西沉渣泛起。这个历史教训是太深刻了。

黄宗江：

晚生黄宗江，我这个晚生也进入 76 了。我 76 可以称晚生，是晚生了嘛。向这样的老同志、老干部、老文化战士致敬。

我在解放前白区的时候就知道有个于光远，可那个时候我还就是一个“文化儿童”，或者说“30 年代反动小孩”（这个帽子我是戴过的。因为文革时我军缺货，就给我戴上了“30 年代反动文人”。我说职称太高了，“30 年代反动小孩”还可以。）。那个时候，当然也还来不及读于光远的东西。四届文代会的时候，文艺界专门请光远同志谈过一次话，跟周扬有点不同。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说重新发现于光远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多少人，尤其文化人，我们被整、被压、被欺、被死，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当然也喊了喊，呻吟了呻吟。而我发现很多人哪，他忍了，他咽了，他甚至还化作一种抚摸着伤痕并带着一种享受的微笑。于光远没有忍，而是深追到底：这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来的？今后到底如何？一直

深追到改革开放。我是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于光远。

于光远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可是，我渐渐又感到：说不得也。今年年初，我告别了一些朋友，我的女儿已经做了社会学助理教授了——社会学我称之为右派学——我到美国她那里去做老太爷。我就做了一个西方的有闲阶级，可是我没忘了东方的无产阶级。我就写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喜剧小品、一个悲剧小品，寄回来了，寄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上海、广州，未能发表。据说文化大革命被整的人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了，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就好像在家里让妈妈给揍了一顿。这是笑话，江青难道是你干妈吗？那么谁又是你干爹呢？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发不出去。所以我渴望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也成了讳莫如深的东西啦。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啊？是姓资姓社的？我说姓社的。我接受民主自由，我不赞成极端民主、绝对自由，可是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也是无止境的，一层高一层的東西。我接受，不但接受我也愿意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样才是有特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东西。我接受这个限制词，可是我不希望这个限制词把民主自由给限制住了。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会？我就是觉得于光远同志，他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民主自由的人，我希望这样的人更多一些。这样中国才真能达到团结稳定、国泰民安，才能真正见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所以，中国还是值得我们活下去的。

秦川：

我过去是个很听话的人，非常习惯于响应上级的号召。但是近年来我略有觉悟，所以最近，我两次响应于光远的号召。一个响应他关于休闲文化的讲话，现在我还要响应他讲的关于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去年 10 月份，我和李锐同志在杭州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它的题目就是：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回顾和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前瞻。所以光远同志的这个号召会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现在就是响应的一个。

但是，你提出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要改变。第一要把没有声音的中国变成有声音的中国，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声音。前三个礼拜我到北京医院去看病，碰到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前任检察长，他就一句话：没有说话的地方啊！我说你怎么没有说话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职务，没地方说话。写了文章也没地方发表。”好在现在于光远他们这些朋友们创办了这样的一个天地，我看不错，是个自由的天地。为什么中国出了个鲁迅呢？现在我们出了个什么呢？当然出了个于光远，他是从夹缝中间奋斗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前提就是必须要总结历史经验。刚才张先生讲到文化环境。这个历史经验也不要 100 年，也不要 50 年，就把文革以来或者建国以来我们中国文化发展中间所碰到的挫折和所遭到的失落，给予认真的总结。如果我们忘记过去，我说我们的文化是悲惨的。

戴煌：

刚才提到文化环境，我在新华社也许知道的情况多一点，文化环境不怎么样。

两年前的今天，《半月谈》发表了一篇文章，吹捧丁关根的，新闻人物介绍，说他怎么好怎么好，当铁道部长怎么有成绩，中央领导怎么重视。最后，11 个

字：业余爱好打桥牌，牌艺精湛。这可倒了霉了。《半月谈》的头头们，就被叫到社党组受领导批评：你们这篇文章有问题呀。什么问题？不说，你们自己去琢磨。《半月谈》开了一天的会，大家在那里琢磨：这篇文章很好啊！怎么有问题呢？可是还在那里检讨，主编、副主编当月奖金也扣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小例子。你看，吹捧他，人家写这 11 个字也没有想到他和邓小平打桥牌的事。是吧？他牌艺确实精湛，有一次在欧美同学会，咱们和杨小燕开座谈会。杨小燕说：有人认为中国打桥牌打得最好的是万里、邓小平，其实不是；打得最好的是丁关根。那时他的政治地位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你要说好话都不行呀，何况我们这些人隔三差五地还来一点刺呢？那更不行。

耀邦去世以后，有人很快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胡耀邦》，里面收了新华社的 11 篇文章，包括穆青、郭超人等等，也有我的一篇。我说发了新华社这么多文章，为什么不给新华社送书呢？哪怕一人送几本样书吧。给编者打电话，回答说可以。我弄了个车，去拉来几百本书，请新华社办公厅给作者转发——有的是分社的记者。隔了多少天没有动静。后来我去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只能负责发穆青、郭超人、南振中，其他所有的人我们不负责发。我说为什么？他不说话。无非那时候就是学生上街了，“六·四”了，好像这就是个敏感的问题。我一气，我来发。在社里面的我送，在分社的我负责贴邮票，给他们寄去。看谁能把我的头砍下来呀！耀邦在台上，新华社那么多的人跟着歌颂，耀邦一下台，一去世，又有了“六·四”，连《胡耀邦》这本书都没有人敢发了。

所以，大家说这个文化环境很不妙，新闻界就是这样。谁在台上就跟着谁唱，谁下台了，或者怎么样了，马上就是翻脸不认人。

那么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就受制于人？我们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就一点都不准动弹了？我说不，咱们还是要动弹。最近我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面有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按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共产党宗旨的理解，我们来独立地进行战斗，我们不受制于人。我看只好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我们的笔才能不停止。这么多年，我们要向于光远学习。他是我们的好前辈，入党比我早好多年，他也是受制于人的，但是自己一直没有停止战斗。我觉得我们今天开光远同志学术生涯 60 周年的座谈会，就是要发扬这种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

胡绩伟：

今天我想谈一个主题以外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光远的理论人生关系密切的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提议成立一个光远健康促进小组，切实有效地促进他更健康更长寿。

光远的学问、文章、道德，是中外驰名的。他的身体不属于他个人，是属于国家，属于社会，属于世界。对他的身体，不是个人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

光远同志著书立说的勤奋，是惊人的。他起床后，常常是脸不洗，牙不刷，就伏案疾书，早饭也拿到书桌上，边吃边写。我同他曾经一起出差，一起到外地去开会视察，在火车上那种人来人往、嘈杂喧闹、摇摇晃晃、车轮轰鸣的条件下，他照样读书写作，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就是在医院里看病，在走廊上等待就诊前的短短几分钟，他也手不释卷。光远同志成为一位高产优产的理论家，他这种勤奋精神，是他获得如此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以为，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适当的休息还是不能缺少的。

光远同志社会活动很多，经常到外地去开会和调查研究。他的老伴最近对我说过：史家胡同这个家，只是他一个常驻的旅馆，他几乎一年四季都飞来飞去，天南海北，常来常往。即使在家，北京的活动也很频繁。光远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活动专家，不知发起过多少学会、协会、研究会，不知组织过多少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不像蜻蜓点水那样一点而过，而是锲而不舍，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很多大事，如关于国土经济的发展，关于海南地区的建立，关于休闲文化的提倡，等等；很多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事，如庭院经济的开发，紫菜籽的培育，饲养蝇蛆，等等，只要他一抓，就大见成效，影响深远。他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直抱着满腔热情、奋力拼搏的精神，各界学者竞相传颂。但是，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工作量应当适当减少，社会活动也应当适当减少，单是旅途的劳顿就应当加以控制。

光远同志培养了很多研究生，扶持了那么多专家学者，帮助了那么多青年，没有见面的崇拜者更是遍及全国。他在家的时候，常常宾客盈门。我多次到他家，几乎都是两批人挤在他那个小房间里。他对来访者热情接待、滔滔讲说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我以为也是应当适当减少的。

总之，我以为，光远同志生活的琴弦绷得太紧，休息得太少太少，娱乐得太少太少，体育锻炼几乎没有，这是十分有损于健康的。难道这种奋不顾身的老习惯老作风，不应该改良一下吗？

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跟今天讨论的文化有关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对待文化人究竟是摧残，还是扶植；究竟是鼓励，还是压制；究竟是想尽办法使得他们短命，还是想各种办法来使得他们长寿。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摧残了文化人，这种文化实在是在世界上都是罕有的。那么现在当然比较好得多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够不够呢？我看很不够，那么摆在面前我们称之为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文化人，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人，我们怎么样子来关心他的健康，如何想办法使他能够健康长寿，我认为这也是个文化问题。就说这么一点。

曾彦修：

今天是10号，昨天是“一二·九”，晚上我就看中央电视台，对“一二·九”运动连屁都不放一声，现在怕学生怕到这个程度，把“一二·九”抹杀得干干净净。共产党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就是产生于知识分子运动和农民运动——我们是依靠上海工人起来的吗？但是现在最怕学生，就是因为“六·四”，以后连“五·四”也不纪念了，昨天公然地不提“一二·九”。所以，这叫什么环境，这是根本把我们历史上这么有战斗的有民族传统的运动放在一边。张学良的进步还不是因为受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刚才光远同志提到，1940年延安地区文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当时没去。这个会上的讲话就是两条路线，很明确。张闻天是1月5日的报告，他讲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词，非常强调民主。我们现在的反盲从、反愚昧、反专制，他统统提出来了。另外，他所解释的科学的、大众的也没有跟这个民主脱钩，也不是就科学讲科学。同样这个会议上，5天以后，1月9日毛泽东作的报告，民主就没有了，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在解释民主政府的大众的表现形式时说，因为是大众的，所以它就是民主的。请问，这辩证法究竟到哪里去了？唯物主义到哪里去了？公开地宣扬形式决定内容了——因为是大众的所以是民主的——白纸黑字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

说我们党在历史上在文化战线上有两条路线，这是事实。一条是毛主席的，毛主席一生反对民主，专政专政再专政，一直到最后 20 年愈来愈专政，这是从一开始就看得出来的，坚决反对这个东西。而张闻天是坚持不同意他的意见，张闻天是《解放》杂志的主编，毛泽东的文章早发 50 天，张闻天的文章晚发 50 天。38 年、40 年初的时候，非战斗性意见，个别最高的人士个别的文章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手段很重要，但是文化手段有一个问题啊，弄得不好，封建的法西斯的专制的专政的也叫手段。所以，现在要利用手段，首先要反对专制的文化手段。那么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不受到专制的独裁的文化手段的控制，你写篇文章哪里给你发啊？再就是光远同志所说的消极的腐败的文化，我们专制的文化手段，腐败的文化手段，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我们这个国家。刚才说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特异功能可以宣传那么多年，这个特异功能的科学家也捧得那么高。文化手段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人不是不赞成文化手段，而是用文化手段来控制一切，搞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如果不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文化手段的根本内容恐怕还是光远同志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科学是“五·四”提出的，但现在绝不能放弃，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根本没达到目的。你说现在有多少民主？前几天报上登黑龙江有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五大连池市，今年秋天农民的粮食全部收购起，但现在一分钱没有拨，这叫什么制度呢？封建制度不是这样，奴隶制度不是这样，还得养活农民哪，还得养活奴隶啊。现在把粮食全部收购，却一分钱不给，而且这个市委市政府还讨论过的，要搞 6 个什么公司，于是把应给农民的钱花掉了。这个事情要叫我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哪。我希望我们上面注意一下，我们下面很多地方就是这样逼着老百姓去造反，不给老百姓一条生路。这种现象我看了跟我的事情一样流泪——我这个人很容易激动感情——我说共产党搞了这么几十年，愣是从农民那里全部剥夺过来，一分钱不给，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啊？我特不理解。

我感觉光远同志他做学问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他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

我讲一件事情，他看问题跟人家不同。1957 年我划了右派，还没有正式处理以前，有一天他的《自然辩证法》出版，跑到出版社，跑到我那里去说：啊呀，曾彦修，你闹了个笑话啊。我就很奇怪，人家说我妨碍革命，他说我闹了一个笑话，可见他对反右派问题是两条心。（于光远：他的名言就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当然不敢怎么样，那时候是个罪人嘛，但我总感觉怎么你这个认识跟人家相差太远了，人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还有就是 1947 年，我们一起搞土改，康生是团长，我们这个团主要是老同志。我们到冀中区党委所在的一个村庄。第二天上午，于光远不在了，下午是人家区党委给我们介绍情况。一个上午他都不在，结果他吃午饭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呢？他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到那个耿长锁（著名劳动模范）所在的村庄，叫吴公村，去参观，去访问耿长锁。耿长锁那天不在。回来他说，他去视察了村庄周围，有 9 条出路，这个村庄通人通车的路有 9 条。他算了一下，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减少 4 条到 5 条。一条路在一个村庄就占了一两百米两三百米啊，这样它的实际功能就浪费掉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把光远看成老师的，这么样一个实际的人。我说你怎么不叫我们一声呢？他说我以为你们没兴趣呢。

另外就是他提倡的笼养苍蝇。苍蝇生下来的幼虫就是蛆啊可以做饲料，非常之好。他不光是提倡，他身上就带着个样品，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请你尝一尝，

味道很香，”他在火车上请一个林学家尝。后来我亲眼看见一次。84年在广东，有一天黄昏，我突然听见他那个小胡的声音。我当时手里有事情，听见声音后，赶快出来。他大概从哪里回来，到那里休息一会儿，吃个晚饭，然后就上飞机。结果他把吴南生找来了，要跟人家谈笼养苍蝇。谈着谈着，他又从口袋里拿出来烤干了的蛆（当然是干净的），请吴南生尝一下。吴南生赞成是赞成，但没有尝试。于光远让我也尝一下，我也没有尝试，因为我没有兴趣。但是他就在那儿吃，就尝。

所以，这么一个人哪，刚才很多同志都讲，确实有着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不是一个号召的问题。这种事情这样干法，在全国，难找啊。从古代到现在，这样的科学家难找，就是外国这样的科学家也难找，当然有啊，因为实验，将细菌传染到自己身上，但这个也不多啊！外国这样的人也确实是可数的呀。这样的科学家，蛆可以做饲料，他就用个袋子装在口袋里，自己尝尝，请请客。总之，我们要学习光远同志这种精神，只服从真理，特别强调宽容。

童大林：

光远同志是我的兄长，师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是兄长，因为他年龄比我大几岁，另外，他的常识、各个方面都比我强很多，所以是一个兄长。师兄呢，运用他的一句话叫做“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跟他有同样的信念，我是称马克思是第一伟人，从他的思想的丰富，从我所接触到的学识，看到马克思真的了不起。在这点，他是我的师兄。

我们相处的时间相当长，1940年我刚从前方回来，到了中央青委，突然发现中央青委来了很多大学生。我是一个初中生，所以看到这些大学生自己就有点自卑感哪。像李锐，我们在中央青委他是一个科长——当时科长了不起呀——但是，他领导下就两个科员，其中一个就是我。最有意思的，于光远当时还不是科长哪，是科员。他是大科员，我是小科员。乔木是中央青委宣传部的部长，专门兼我们这个科的科长，我们三个人管教育。教育对象就是我们大砭沟下面的一个祠堂，一个女教师下面教了五六个小孩。胡乔木就领导我们三个人去考察研究了。我们这样认识的。于光远当时在我心中是了不起的。每天起来，他干什么呢？他牙不刷，什么都不干，就趴在桌子上搞翻译，他懂得德文哪。翻译什么呢？马克思给燕妮的情诗。如果说他是文学家，他早就是文学家了。我这个人只能扫地。当时前方回来，我就跑到山上锻炼去了，下来他还是在埋头翻译他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他写作是最勤奋的。今天我没有看见他写东西了，因为他要听人家对他有什么评论哪，所以他不写。任何会议，他都在写，也可能耳朵聋一点，听不到人家怎么发言，他就干脆写了。他写，一直写了很多。我们在延安编写过《轻骑队》，我是第三任的主编。第一任主编叫萧平（跟田家英很好，从四川出来的，后来40年到前线被自己人用枪打死了），第二任就是许立群（曾经当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第三任是我了。这些人里面写稿子最积极的第一是许立群，第二个是于光远。但是他的文风不是调皮的，而是比较正统的，比方写过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什么我们的电讯不用路透社而用塔斯社。我们出了两年，他几乎每期都写。

从我认识他起一直到今天，他是一个多产作家。他为什么能多产？我认为，他得力于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源流所以他的思想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一直到现在。他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是受到邓小平的欣赏的，称是中国人翻译《自然辩证法》最好的一个。我是听方毅讲的，我当时在科委。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什么都有，他就是类似这样。他的思想源泉我认为就是《自然辩证法》，

所以有这么丰富的底子，一直到现在他成为我们这一代一个奇才，奇人，特殊的人物，他所牵涉的领域是最广的。

因此，最好能写一本《于光远评传》，真正的评传。光远有他的特点，应该抓住他的特点实事求是来写，而不是一般的東西。

我接触到一些国际上的人物，他们总是不知道中国有什么学家，包括经济学家，我也很难回答他们。几个老的经济学家，包括陈翰笙、孙冶方、钱俊瑞、薛暮桥，我们现在感到他们是了不起的，但是外国人都不知道。不但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方面。因此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中国是有一代的人物在各个领域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地介绍，所以国际上不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是巨大的（虽然问题一大堆），只要你到下面看一看，最近三四年的时间，所有的城市都改变了，从哪来的？人物都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自己还是见物不见人哪。

最近我欣赏上海市长徐匡迪在国庆节祝辞里讲的：“要谋求新发展，新的发展也需要新的理念。”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往前发展的话，没有新的理念不行的。我们搞了这18年来，地球上产生了很多新的观点，新的理念，但是还没有得到承认。光远同志有些观点谁承认他？就是我们看看，哦，写得不错。

所以，需要我们对光远同志的一生作评传，这一生到底是喜剧悲剧很难说。对陆定一和周扬，我一直是公开讲的，他们两个人一生是悲剧。甚至正式组织部门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同样这么讲。光远同志这一生我希望最后不是悲剧，所以希望他长寿一点，能够到85周年、95周年我们再来开会，对他作新的评论。你们两次开于光远的会我没有参加，不知道是怎么评论他的。我有我的评论，比方讲他的科学处，是厉害的。当时中宣部提出“百家争鸣”，后来毛主席自己都修改“百家争鸣”的观点了，但是我们的科学处，特别是在那个最有名的遗传学的争论中，他力求保护了一批科学家（谭家正等），功绩是大的，光远同志在这方面是冲锋陷阵的。又比方讲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方面，他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在常州开会，何方也参加了吧，提出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到共产主义都要讲商品经济。”这个观点一出来北京有些人就纷纷扬扬了。我当时在体改研究会，我们是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我们怎么办呢？再开一次会。当时光远同志很支持我们，他参加了。我们写了一个简报，送到当时的总书记、总理那里，他们是点头同意的。这个事对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是了不起的，是有功绩的。光远同志起了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方面，他是走在我们搞研究的人的前面的。

我讲，我经常引以为师兄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还有其他方面，他的思维是科学的思维，文化的思维，现在还有艺术的思维，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

吴象：

光远同志最使我感到敬佩、感动的，他有一种打不倒的积极性，有一种不知疲倦的追求。有一次，我到他家，他给我看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问我里面是什么？我猜了好几个都猜错了。后来一揭开呢，里面都是铅笔头。他说我有一个习惯：我都是用铅笔，想到什么拿到随便一张什么纸就写，铅笔快用完的时候，就把它刨一刨保存下来，这么一大盒子是我近两年的成绩。

另外，许多同志讲到，我也见过，坐火车、飞机，开会，他都在写。他去黄山，因为腿走不动，别人去看山，他看窗户，从窗户里面看山。但是他考虑得很多，后来发表了一套对黄山的开发很重要的意见。正是这样一种不知疲倦的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文化大师，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可以摆一溜的名词，过去我们小时候就叫文化人。他现在不仅是文化人而且是文化大师，是综

合性的多方面的。

今天这个会上，他又提出了一个 21 世纪文化问题，指出了当前大转变时期的消极的文化现象。这非常重要。就在两三天以前，《经济日报》一版头条，有一篇通讯，大概叫做文化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讲的是浙江横店集团如何利用企业文化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内容大部分都是对的。但是据我所知，就在这个横店，修了一个大佛庙，这并不是一个原来很有名或者很有价值的庙。现在许多地方有了钱就修庙，理由说是为了赚钱，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江苏江阴，全国第一村的华西大队，搞了一个二十四孝，把过去鲁迅深恶痛绝的那些东西都包括进去了。还搞了一个党庙，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是缺少了一个刘少奇（龚育之同志去了就给他们提出建议，闹这个东西嘛当然也可以，但毛刘周朱，怎么刘少奇没有了？他们说我们这里人对刘少奇不太熟悉）。“党庙”，当地正式名词这样叫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严重的文化问题。

光远同志的特点，就是不断地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学者的角度看问题，因此他往往充满乐观主义态度，他把一切都看得很远，看得很深。也因为如此，有时他就可以把一些很细小的问题放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阐述它的意义。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曹思源：

对于光远的文化思想能不能做一个概括？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开放性。

第一，他在教育上是开放式的。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外语重要，于光远本身就是德文很好。他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在招生简章上说了，英法德日俄，五门外语任选一门，高标准，但他下面留了个漏洞：如果专业成绩优异，仅仅外语准备不足的，可以申请免试。我就从这个洞里钻过来了。我翻遍了 1979 年的所有招生简章，研究生招生通通要外语，把我们关在门外了。只有于光远这里开了一个洞，那么没有于光远这个洞，曹思源现在还在江西景德镇市委党校哪。这个洞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

第二，粉碎“四人帮”，那个时候还刚刚在“拨乱反正”，毛泽东的偶像还是非常之神秘的。于光远招研究生比别人多一个条件——任何人招研究生，就是考得取考不取考考再说嘛——于光远不是这样子，考以前就要筛掉一半。他怎么筛呢？在报名的时候就要交篇论文，论文不合格的不发准考证，考试资格都没有。我就交了篇论文：《评左倾领导路线》。就是批毛泽东。我们长期以来讲的是左的右的错误路线对毛泽东思想的干扰，这种“干扰”的路线遭到了长期的无情的批判。可是我认为“被干扰”的那种正统的领导的路线，它本身就是错了。所以我要批判的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那么这篇文章寄给于光远了。那是很冒险的，我不认识于光远啊，他把我告了怎么办哪，对不对？告了我得进监狱啊。但是于光远没有把我排在门外，而是收了进来（当然还是凭考试成绩的啊，不是凭“反毛”进来的啊）。如果没有开放的文化思想，一个导师，招一个批毛泽东的人当研究生，这风险很大啊，对不对？

于光远招我曹思源，曹思源弄了一个《破产法》，我就带了个“曹破产”的帽子。光远同志就说你这个研究生搞了个《破产法》，到底是不是光荣自有评说。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因此我认为开放性是于光远文化思想最宝贵的部分。

李辉：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文化手段。我觉得光远先生他充分地在有限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来使用他手中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他写文章。我觉得他的文章给人带来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他的那种智慧，经济学家理性的东西和情感的东西是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如果读过他的一些随笔文章就可以感到，他的文章中有许多的幽默，这种幽默是哲学家的，当然也是政治家、思想家的那种幽默。他对历史的那种反思，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作了哲学的思考，他以一种很朴实的，有的时候又是很俏皮的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我觉得这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可宝贵的一些新的东西。用文学的笔，来多写写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感受，对历史的一些思考的东西，这样可能使我们整个文坛的创作更加丰富多彩。

陈四益：

于光远同志是我的长辈，在我自己思想、世界观形成过程当中，是读他的书而逐渐形成的。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读社会发展史，中学的时候读社会发展史，大学的时候读政治经济学，都是学的于光远同志的书。

那么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他的不老。人老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人也是逐渐都老了，但是思想永远不能老，永远有新的东西，永远提出新的东西。我觉得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值得我学习的。我看到人家欢呼，外国人欢呼大概都是欢呼一种声音，像俄文叫“乌拉”，但唯独中国人欢呼是“万岁”。“万岁”这个东西大概是永远做不到的，人不能万岁，现在大家好像明白一点了。现在人们吃各种口服药呀营养液呀，也许是想多活一点，但是谁也没有想过再活万岁。然而以前确实有过“万岁的时代”，老是觉得要“万岁”。但思想能不能够“万岁”？我觉得任何一种思想恐怕都不能“万岁”的，如果一种思想“万岁”了，这个思想就死掉了。因为它就不能再有发展，不能再前进了。所以，我觉得光远同志给我一个最深的教益，就是思想永远不要停止，永远不要以为哪一种思想是可以“万岁”的，永远要有新的探索，永远要有新的发展，这样才会有活力。

郑仲兵：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肯定还有好多同志要说活的。最后再让于老说几句吧。他是个“二表人材”，所以最后还是要给他留有“表现”的时间。

于光远：

刚才郑仲兵说我是个“二表人材”，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听表扬。我倒是有两条限制：表现必须真实，听了表扬不能忘乎所以。还是对自己冷静地来评价。

刚才大林、李锐都讲，我受恩格斯思想影响比较大。恩格斯有个自白，称自己的特点是“一知半解”，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合适。（李锐：恩格斯没进过大学。）他也是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又是军事啦，又是金融啦，又是喝酒啦。那么我呢？如果他是一知半解，我在一知半解里面再打一个折扣。我的特点我自己知道，是浅，很浅薄。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多大很复杂的问题，说老实话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非常之简单，所以什么事情都好说话，复杂就是自己把它想复杂了，复杂的环境、文化环境逼得你非复杂不可。我觉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有什么难懂的？“二表人材”不很简单吗？谁不爱

表现，谁不爱表扬？我这次去长沙参加电影节，遇到一个电影摄影家。我说你别看电影节，如果你不爱表现，不爱表扬，干嘛去开这个会啊？天天爱表扬，天天批评表扬。所以，这无非就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不理解我就说不理解，不懂就是不懂。刚才李锐讲的那个小孩的对话，我找到这个小孩谈了一次话。我就是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文革”不许讲？我不懂。我就写了篇文章《这是为什么》。你不讲为什么，那我只能猜了，猜就不好啦，我一猜可能就把事情猜过头了。我说你们告诉我是为什么，就解除我多年来的疑虑。无非按逻辑推理——如果说不许讲，为什么？就是你怕讲嘛，你在“文革”当中不大干净吧？你不敢讲也许还有想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所以不许讲？我不愿意做这种推测，所以请你告诉我好了，老老实实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奇怪嘛，“文革”时期具有这么大教育意义的东西不许讲。我什么事情就有一条，我就问问为什么。这也很重要，许多事情就是为什么嘛。做学问的道理有时候很简单，问问为什么就知道为什么了。我觉得，我对事情就是一知半解，所以大家说我很多很多，其实我专家的范围很小。

很多事情我是门外汉。我站在门口向门里望了一望，再望了一望，望出了名堂来我就讲话了。我总说我的好些评论哪，你不要相信我是专家，把我看成是“望家”，“望家评论”，望望，望出来的一点意见，是不可靠的。人家说你这个实在好，我建议我的刊物里面开辟一栏，专家评论以外开个《望家评论》，让那些望家在那儿发表意见。我的意见就是没有调查也可以有点发言权，不是许多读者没办法调查也发言了吗？承认这个事实，有点发言权。但是呢，人家说这个名称不大好，听错了还以为是“妄加评论”呢。我说我的《望家评论》就是妄加评论，是不是？就是证据不充分的评论。

我的许多意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倒觉得呢，我很省劲，也没有做深刻的研究，不可能做深刻的研究，都有兴趣，一知半解。再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对则改。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事实如此。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就是这么回事嘛。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有什么，离开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干什么？有什么意思呢？也许有人觉得有意思，我也不反对，他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搞那些虚虚假假的，或者是，本身就没多少学问，浅入深出，故弄玄虚。我有些底子也很差，文学底子也很差，国学底子也很差。我知道的。我高中时候认识一个比我低两班的同学，他有国学底子，后来跟他一块学了半学年。再后来，无事不相求，再打听也打听不到这个人。有时候，洋学也出笑话，中国的也出笑话，不知道什么就成了笑话，真可以拿出来的可笑的事是很多的，什么大文化人哪，博才啊。这是开玩笑说。最近我跟牧惠打电话说，我的朋友彭修云写了本书，《按牌理出牌》。我把它读了破句，读成“按牌·理出牌”。“按牌理出牌”是香港的语言，按牌的理、牌的道理、牌的规律出牌，我以为他是说“把牌理成牌”。我说编辑读你这本书很辛苦，把很多文章理出了牌了。你说说我。我的文章《羊城晚报》发表的，编辑可能看不出来，闹笑话了。我的笑话事多极了。笑话就是笑话，一个人不断地有笑话，不断地向大家承认笑话，知道后就进步了。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按牌理出牌的意思，就不放心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哪一位指出你弄错了，啊，弄错了弄错了。现在我查字典也没查出，“按牌理出牌”字典的说法，字典没有。我不是香港人，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原谅。我对异地语言不了解，可以原谅，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这个语言。笑话很多。

我觉得不怕浅，本来世界上的许多事物有的深，研究以后就浅了，就深入浅出。有人来不来就浅入浅出，但浅入浅出也比浅入深出要好。不要去弄虚作假，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大家在这些事情上敲敲打打，我一辈子被敲打多少次了，久敲成精。人家说我是“老运动员”，也有这种资格了。这也倒是真的，经历多少次的运动，做“运动员”过来的，也有这个经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权威我没有什么崇拜，每个人都有缺点。恩格斯的自白里头说他感觉最幸福的是什么呢？他填的是爱喝酒，爱喝 1848 年出产的沙托马尔伯酒。最不幸的是什么呢？拔牙。这很现实的，拔牙多痛苦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可笑的事，苏联马恩全集的编者加了一个注解，说沙托马尔伯酒是酒的商标，1848 年是暗示 1848 年那场革命。这就是胡搞了，革命观念那么强，可笑不可笑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干起活来还挺有意思，发现各式可笑的事情。刚才老胡说希望我身体健康，看看笑话，哈哈笑，这也是一种健康之术。世界上可笑之事甚多，看着挺开心的。恩格斯自白里填他喜好什么？喜好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我这回在金石滩，我就捉弄一下子，我很高兴，我捉弄得他不断地输掉了。各种兴趣都有吧，一个真实的人哪有这么多严肃的事啊？有时候就要开开玩笑。

我对自己的分析有三部分。一部分非常严肃，像大问题，像理论问题，像政治问题，这是不可救药的，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工作，脑袋里摆不脱这些。家里人也讨厌：你又讲政治。我说我没有办法了，我这辈子搞这么多年政治，离开政治也不行呐，离开理论也不行呐。第二部分无非是帮腔了，大家都有事，你对这有兴趣，大家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吧。第三类就是生活，开开玩笑，怎么高兴就怎么来，这也是养生之道之一啊。我当然也是有弱点有缺点的了，也靠这个办法。

我现在对酒真是有研究了。今年我无论如何把我关于酒的两部书出版。其中一部是《于光远评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我查了 400 多条语录，都是讲喝酒的，评注一番，完全是开玩笑的。一部叫《酒啦集》，我是酒的啦啦队。所出差错，大概不至于莫名其妙地要作检讨吧。

我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来给我评价，对我的这些介绍，反正我自己要警惕自己，知道到底自己是吃几碗饭的。但是也有一点优点，优点就是浅，还比较老实，不装腔作势。当然我讨厌的人呢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伺机整人。我觉得帮助别人整人的人也都挺可悲，打小报告啊，可悲，有什么意思嘛。

我总的觉得现在是两个有限，一个我们上层建筑的作用有限，我们写写文章摇摇笔杆的作用更有限。坏的文章、好的文章作用都有限，不就是文章嘛，有多大了不起的。不但文章，整个上层建筑的作用也有限，按马克思主义原理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的发展，人人都要生活得好一点，发展生产力，你们阻止得了吗？我就是有点看不起，连我自己都看不起，作用有限，有作用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一。第二，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前看。为什么？很有希望嘛。为什么向后看呢？整个世界历史都在进步。第三，我觉得要长期奋斗。21 世纪肯定到了最后一年还会有人说特异功能，肯定要有。人就这么迷信，这是现代愚昧、现代蒙昧、现代野蛮，那可真是岂止疯癫。我们要长期奋斗，但是我们一方面要作长期奋斗的准备，一方面每个人要尽力量，往前推进一点点也好。世界就是这么发展的。我的散文集出版时我找不到书名，后来郑仲兵帮我找了刘长卿的两句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整个世界就是在看不见听无声中发展的。不要想轰轰烈烈，不可能轰轰烈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整个世界发展生产力，这儿开个工厂，他那儿办个事情，不就是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吗？我觉得不要有一种自己夸大的估量，自己的作用怎么样也是有限，不管你是否在很高的职位上，你的作用——有限！我判断你是有限的。整个这么多人都在生产，这么多人在发展生产力，这么多人都在工作，这么多人都在推进，你有什么作用哪？有作用，

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有时候的作用挺让人讨厌，但是有限，我不大把他看得了不起。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我的看法也许是到了 80 岁就看穿了，但是呢，我还是乐观的看穿，不是悲观的看穿，不想无所作为，至少大家来推进推进社会也好。

牧惠：

今天这个会议大家谈了很好的意见。大家都互相启发帮助，激励我们向光远同志学习，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自己的文化手段，来建立光远同志讲的 21 世纪的新文化。谢谢。散会。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记录四万余字，本刊有删节）